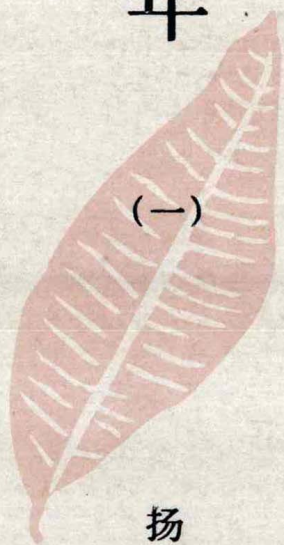


D U S H U

# 《读书》十年

一九八六——一九九〇

(一)



扬之水 著

中华书局

# 读书

D U S H U

## 十年

(一)

一九八六——一九九〇

扬之水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十年. 1, 1986 ~ 1990/扬之水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 (2012. 2 重印)

ISBN 978 - 7 - 101 - 07934 - 0

I. 读… II. 扬… III. ①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5884 号

---

**书 名** 《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〇

**著 者** 扬之水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封面设计** 陆智昌

**版式设计** 刘 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frac{3}{4}$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8001 -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34 - 0

**定 价** 48.00 元

---

# 序

## 一

沈  
昌  
文

上天安排，让我在二三十年前认识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实的小女子：扬之水。

我那时在三联书店工作，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务。《读书》是出版界名流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创办的。我进去后发现，编这杂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刚挨过大整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陈翰伯找来的冯亦代。冯先生那时已年过六十，过去是外文出版局的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是党外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他在文化界号称“冯二哥”，以善于排难解纷著称。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祸从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被打成“美蒋特务”、“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多年劳役摧残。现在他刚恢复名誉，复出任职，自然干劲十足。陈翰伯可谓识人。

另一个副主编倪子明，是范用多年的老战友，出版总署的一位

老处长。他是老党员，在党内挨过整，说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认识胡风。这位老党员是位少说话多干事的老实人。连他这样的人，过去也要挨整，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奇怪。他党龄很长，因此在编辑部地位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编龄”说，他最长。他曾是老共产党员，据说胡绳当年都还是他介绍入党的。范用聘他担任执行主编，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范用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办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划上“右派”的。现在作此安排，可见改革开放那些年头思想解放的深度和范用他们的胆略。

因冯亦代的关系，又引进了著名的画家丁聪来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冯亦代一样，为人“四海”，广交朋友。冯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别谈得来。

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家有几十年悠久进步历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时却落得个“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的悲惨境地。我们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办公。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忙无比。因此，编辑部内十分需要操作具体编务的助手。那时能找到的都是刚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们中间找对书本和知识感兴趣的年轻人。好在我们这些行政上的所谓“领导”，普遍学历都是初中。当时的实际负责人董秀玉女士，是五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本人更加特别一点：正式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而最早我们聘用的一位同事，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吴彬。还有一位当今的大学者，王焱，当年进《读书》工作以前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也

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那些老前辈觉得这么一些中学生当他们的助手，也还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对这些知青，一点不歧视。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绍一位女士加入编辑部。她过去为《读书》投过稿，不算陌生。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小姐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样就同这位女士成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却往往“讷于言”，让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细。只记得，某日，我忽然请她背诵党纲，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觉得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过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编政治读物，所以我只会这样考核部下。

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是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学，所以访行以前必作充分准备。可是金老同扬之水更谈得来。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来五篇，都请她代为处理，他对扬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张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对她极有好评。张中行先生对扬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写了一篇谈扬女士的专文，居然说：“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实为我毕生所仅见。

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

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她说过：“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读书》，一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这方面受益就特别多。他特喜欢陈散原的诗，我帮他借，借完以后我自个儿又抄了好多，全都是营养。”

一九九六年，扬之水与我同时离开三联书店。我是退休，她是转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举。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论著，于是人们问起她，我往往回答说：她现在在开文化卡车。她在文化大道上驶行不休，畅通无已，委实高兴。

《读书》杂志在前辈的带领下，在吴彬、王焱、扬之水这么一些中学生的实际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辈的带领下，一大批初中生们的促进帮助下，慢慢地、不得已地蹒跚前进；而扬之水这位卡车司机，怎么能在《读书》杂志打工若干年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此熟练地驰骋在文化学术的大道上，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谜。要知道谜底，请一读扬之水女士的这本日记。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 序 二

吴  
彬

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笔名扬之水，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我们的关系就如歌中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算许久不见面，碰头时仍像昨天下班刚分手今天又见到一样，没有任何隔阂与生疏感。不论说什么话谈什么事，想法差距再大也尽可随意放言，从不担心对方会介意，真的听着不顺耳了，也就是自认晦气而已。我仗着比她大两岁，有时还要说几句带点儿教训意味的话，她全然无所谓，我也一样不在意。

这就是我们的“老同事”之谊，这样互相绝对信任、不亲密但无间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同事”，没有定位为“朋友”。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同事之谊”更可宝贵。我们是在《读书》杂志做“同事”的，那是我们全力以赴求知、充满激情工作的岁月，是我们的青年时代。

赵丽雅好不容易地下了决心要出版这部十年的日记，请我帮她编辑和写篇序，而且还指定序言不许写她个人而要写《读书》；我也



好不容易地才下了决心让自己暂时回到早已走过的时空中去，找找当年的脚印，想想留在自己感觉和记忆中的《读书》——只是我的，不是赵丽雅的，也不是其他人的，当然更是挂一漏万的——《读书》。

我是在《读书》创刊之前，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正在筹备的刊物的。那时我是个刚刚从边疆回到北京的知识青年，也叫做“待业青年”，来编辑部只是义务帮忙打打杂。连初中都没有正经读过的我，对这里充满了景仰和好奇。

《读书》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了当时的编委会。策划这本期刊时，他们得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知识界老一代中坚人物的大力支持。听范用先生说，当时杂志名称初拟为《读书生活》。征求意见时，夏衍先生说，“读书”就好，何必“生活”，刊名遂由此而定为《读书》。我有时想，也许加上“生活”二字，杂志会是另一种面貌也未可知。

杂志的创刊意图是：针对此前三十年对读书所设的种种禁区而倡导阅读的自由。刊物的方针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提倡读书、思考、探讨，对当时思想界的种种混乱想法和现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读书》的方针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的《两周年告读者》中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陈翰伯先生。

创刊前的几个月里，编辑部始终洋溢着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和董秀玉女士是具体的操作人员。我跟在董秀玉后面听候指示。董秀玉当时很年轻，大家都叫她“小董”（后来她从香港回来当三联书店总经理时，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叫她“老董”）。那时，前辈们虽至少是花甲之年的人，但心气热情之高却如年轻人，他们天天乘公交车来朝内大街一六六号上班，开会时不是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就是激烈争论。前三期的草目出来时，一位前辈看到在一边伸着脖子的我，就递过来一份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记得当时的目录中开宗明义就是《读书无禁区》，接下来有《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等等，当然说：太好了。不料前辈说，这话太泛了，怎么好法？我回答，这是大家都想说又没有地方说的话。他这才点点头：这还差不多。

为了让杂志杜绝错字，编辑部拿出严防死守的绝活，除了专职校对的前两校外，由我和董秀玉在三校时担任“读校”，就是我们俩轮流一个读原稿一个看校样来校对全刊的约十六万字。读稿时要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读出来，什么“点”、“圈”、“书名”、“冒”、“上引下引”之类。读完一期杂志要整整三天，真是读得头昏脑胀、口干舌燥。前三期杂志就是我们两个这么读出来的。董秀玉曾是业务最好的优秀校对员，我对校对业务的知识，包括各种校对符号的标示方法等等，基本都是在这个时候跟她学的，也算是出自名师门下。

看到有古朴端庄绿色封面的第一期《读书》，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音乐会上，“小董”从印刷厂直接来到剧场，带着新的第一期杂志，当时编辑部的先生们都在这里，那种开心真是无以言表。不过，在那以后我暂时离开了编辑部几个月，走时却没有想到还能回来。

因为杂志是属于出版社的，我作为“待业知青”不能进入这样的国营机构，出版社也没有可以招收人员的“指标”。我需要起码先使自己具有“全民所有制”机构人员的身分，才有可能“自带指标”进入出版社，那真是谈何容易！但天无绝人之路，参加了当时面向知识青年的招工考试后，我进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工厂”去当油漆工。不想几个月后，董秀玉就去工厂为我办了调动手续。如同做梦一样，我又回到了《读书》编辑部，从此一待就是三十年。

我回到编辑部已经热闹多了，编辑人员开始增加，沈昌文先生作为执行主编执掌了全部编辑工作，王焱、贾宝兰、杨进、倪乐、赵丽雅等也陆续来到《读书》。

在各位经验和学识深厚的前辈引领下，我们既兴奋又兢兢业业地学习办刊的工作。杂志是自创刊始就围绕着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所关注的种种问题组织编辑工作的，我觉得它也时时在对社会思潮的反映中演变着自身的面貌。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可以说是早期阶段，《读书无禁区》的巨大影响使它广受注目，各种不同意见也相继而至，第六期即有一篇文章是《读书不能“无禁区”》，认为必须禁止反动、黄色的读物，如无禁区，必定天下大乱。同期还有《禁锢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等等。同时又有一系列文字如《读书应当无禁区》、《解放“内部书”》、《借书难》、《当代的也要“拿来”》，以及朱虹评论《简·爱》的文章《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和林大中的《黄色·色情·爱情》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讨论，配合突破多年来森严的读书禁区。

刊物的老一辈主持者都是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洗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针对“文革”中的思想禁锢，《读书》致力于提倡在学术问题上应该允许心平气和的平等讨论，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金春峰的《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林欣的《反对封建君主制的强大思想武器——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都是直接针对社会现实的；在经济学的范围内，杂志组织发表了《经济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杨培新）、《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评述》（苏绍智）、《坚持从生产力出发研究、解决经济问题》（唐宗焜）等；而最突出的是李以洪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开启了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林春、李银河的《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提出封建文化是现代化的死敌，包括外国文学领域里柳鸣九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等，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有冲击力的文章。

这一时期杂志的面貌，是当时的主持者们自身的经历、思想和追求，在与社会思潮的激荡互动中形成的。他们在痛定思痛后，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热潮。为了引导讨论的深入，我记得史枚先生往往亲自操刀，伏案赶写出一篇篇适应需要的文字以笔名发表。

这个时期之后曾有过一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规模批评，敏感之际，杂志发了《学术自由与自由化》的文章，虽然意在区分两种自由的界限，但在编刊的方针上，明显开始疏离政治，在思路上凸现出“知识分子化”趋向，然对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活动这一最不易受干扰领域的关注和参与则继续保持了下去。

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研究的关注起始于对国外现当代学术思想

的介绍，比如《〈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赵毅衡）当是对比较文学最早的介绍，《记〈菊与刀〉》（金克木）在回顾旧书时介绍人类学与比较文化学，《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赵鑫珊）所倡导的观点今人会以为并不新鲜，但这些在当时都是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开风气之作。

接下来，中国文学的创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杂志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王蒙）、《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刘心武）即是预示新时期文学创作大潮将起的先声：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那批作家已经起步，开始把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读书》此一期间连续发表了对王蒙、刘心武、张洁、宗璞、谌容、张辛欣、张抗抗、张承志、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配合并推动南北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大潮的涌动。同时《读书》对大量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观念的评述，如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专栏，阐述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语言学人类学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等一系列理论观念，还有热闹一时的介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三论”的文章，都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兴起作了知识和理论的准备。

对学术和治学问题的讨论，还着重表现在一系列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文章上，其中有影响的有柯灵的《促膝闲话中书君》、郑朝宗的《但开风气不为师》、钟元凯的《借得丹青写精神——〈谈艺录〉方法谈》等等。这个阶段对钱先生的研究属于开发性的工作，不像现在有些是属于赶时髦了。

接近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是《读书》创刊的五周年，刊物已

经相对成熟，面貌、性格、文章的风格也基本确立，拥有了一支比较稳固的高质量作者队伍。这支队伍包含了“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开放，在鼓励读书、求知等相对良性的社会氛围下养成的学人中的精华，虽不敢说《读书》网罗了所有的人才，但如果说当时的读书人都愿为《读书》所用，庶几近乎事实。

然时至此时，《读书》作者群的主要力量还是以老学者、老文化人为主，但也差不多从此时开始，这一状况开始变化，编辑部有意识地引进生力军，大家称之为“新面孔”。这首先是因为在几年开放、搞活的社会氛围下，人文学科和文化思想界思维活跃、热浪迭起，许多以往无法讨论的问题相继摆上桌面，例如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发表的《周作人的是非功罪应该研究》（舒芜）就是信号之一。而且此时，一直作为助手的年轻编辑们也开始相对独立地工作，在执行主编沈昌文先生主导下，王焱已经是编辑部主任，赵丽雅、杨丽华等也都陆续进入编辑部，称得上兵强马壮了。不过，这个新老的转型过程也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有过争论的。开发年轻作者的努力一方面得到肯定，但另一方面年轻作者文字的不够成熟也为人诟病，文风问题一直是大家关心和努力的焦点，共识是经过反复讨论才逐渐达成的。

被人津津乐道的“八十年代”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明显浮出水面，首先是文学界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势头在这一年居然盖过了几年来一直光彩夺目的文学创作。从“寻根热”等等文学潮流中，编辑部受到启发，刊物宗旨“文化思想评论”中的“文化”一词开始有了着落。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对社会、历史、当下的思考与观察，既使刊物有了更深入的角度，也赋予

了刊物更深邃的面貌,《读书》进入了一个全盛期。

这个时期,各种面向社会的活动开始展开,用主编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主要从事的是各种学术组织工作。一九八四年六月,编辑部开办了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活动,与各界读书人广交朋友。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杂志开设了“读书服务日之页”专栏,编辑们每月都各自撰写“新书录”介绍新书,在以“扬之水”署名的这本日记中,就录有她当时为这个专栏所写的文字。此外,一九八五年第七期开设了“评论的评论”专栏,评价当代文学评论现状并呈现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面貌。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开设了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专栏,这组文字已经被当作那个具有创造性的年代的标志之一。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刊出了一组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笔谈(陈平原、靳大成、王友琴),第二期还有甘阳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在当时,这些都是开启思路的文章。同一时段,张维平、伍晓鹰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话”专栏,梁治平的比较法律系列文章,赵一凡阐释西方学术思想、文化思想脉络的“哈佛读书札记”专栏都在此时开始。这异彩纷呈、繁忙热闹的年头也正是赵丽雅进入《读书》编辑部的时候,她的日记虽然写得很是节制,但仍可以看到当时《读书》的工作状态。

一九八七年,是对知识分子心态、人格及忧患意识讨论最多的一年,这种讨论是《读书》一以贯之的本色之一。开年第一期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许纪霖)、《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吴晓东)及第二期《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眼界》(钱理群)等文章就显示出了这个关注点。也是这一年,经济学理论、管理科学和文学、语言学、史学、美学、哲学、文化批判

等学科的研究有了深化的趋向，社会形势尽管阴晴不定，刊物也时时遭遇小挫，但势头未减。而且往往正是在这种时刻，《读书》更能发挥优势。因为在沉静下来时，知识界的思考更深沉，观点更稳健，内涵更深厚，更能开掘出文化思想评论的深度，而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制定的办刊方针也更能显出独特的长处。

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是文学、艺术领域内先锋思潮的高潮期。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展现出的前卫艺术现象，给知识界带来复杂的冲击波。高名潞、周彦等在《读书》发表的对话录《前卫艺术与文化现实》对大展和现代先锋艺术进行了反思。

这两年也是广泛谈论“文化危机”、对文化现状充满了忧心的年头。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杂志有《向萨特告别》（木弓），同时还有学者倡言“告别十九世纪”，似乎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潮的体现。知识分子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失落感、危机感日益深重——刘小枫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及以后的“西方现代神学一瞥”专栏文字、吕叔湘的《“书太多了”》、叶秀山的《守护着那诗的意境》、赵越胜的《走向无压抑文明》等文章，都流露出一种寻求终极价值、超越现状、复归自我的要求，从中可以看出商品社会开始使知识分子心理失衡，心灵困境越益突出。而《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许纪霖）、《一个知识分子跨越世纪的选择》（盛斌）、《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徐钧尧）、《知识分子的“理想国”》（顾昕），可以看作是面对现实寻求答案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在挣扎、在寻找立足点。但一九八八年晚些时候的文章如《反文化的失败》（王干）、《困惑的经济与经济学的困惑》（王跃生）、《文化的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萧功秦）以至最后第十二期的头



条文章《我们能走出“低谷”吗？》（周彦）依然还是渗透着一种困惑的心情。

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也是从谈论困境开始的，《悲壮的努力——新潮小说的困境》（李陀等）、《不抱幻想，也不绝望》（默默）以及五月号《百无一用是书生》（金克木）等文章从标题就会感觉到那种无奈的心态；《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严搏非）对“权威”的探讨，展示的是一种虽清醒但也更为复杂的心态；而《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甘阳）与《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刘东），可以算作是在艰难的状况下仍坚持着的艰难的思考。

之后，《读书》与全体知识界一起进入了九十年代，也是这本日记告一段落的时候。此时大家都正在尽力调整心态，主编认为，刊物能沉静下来，从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和被“创新”赶得团团转中解脱出来，未尝没有好处。《读书》试图换个角度重新去掂量和思考历史及现状，力求面对现实去探寻当代知识分子的位置，思索何以立足、何以自处，希望以甘于寂寞的坚持，保持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杂志当时发表的吴方与张中行所写的一系列探讨近现代学人形迹、思想、精神境界的文章，以及关注近代学术史、开展建立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三十多年前，办一本《读书》这样的期刊是艰难的。在它的生命之路上，夭折的可能性也不止一次产生过，但《读书》生存了下来，至今已经度过了它的而立之年。在多年的经历之后，我体悟到了：《读书》能够坚持下来，必须对那些创办了它的前辈出版家、对